

# 陈家港二十六人坑

作者:谢来法 陈树标 王万佳

1939年3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苏北重镇陈家港。盘踞在陈家港的日军为加强和巩固黑暗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在海河防线和港城四周到处构筑炮楼碉堡铁丝网,设置据点圩门。据今年90岁的谢以生老人回忆:“南圩门建在陈家港老街的西南方,在现在的伏堆河和民生河闸北交界处。圩门外不远处有一个乱坟岗,当地人称南坟岗”。每当月黑风高之夜,南坟岗阴森恐怖,时有鬼火闪烁,并伴有悲啼哀嚎之声,令人毛骨悚然。这里就是当年日本法西斯屠杀抗日人士和无辜百姓的杀人场。

1939年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入侵陈家港,担任陈家港守备的国民党第八军望风而逃。陈家港沦陷后,陈家港的常备队残部撤退到盐场圩下,日寇采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等以华治华之策收买常备队。常备队大队长黄维田怕留下千古骂名,不愿当汉奸,被迫远走他乡。许维斋乘机投靠日寇接受招安,取而代之当起了常备队大队长,旋即常备队改为伪自卫团,许自封团长,死心塌地充当汉奸,堕落成日本鬼子的帮凶和走狗,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日寇为大肆掠夺盐,对济南盐场实行残酷的“军管理”。常备队大队长许维斋伪作伙,认贼作父,积极配合日军清圩清乡,推行“强化治安”,与日本人沆瀣一气,对陈家港和广大盐区实行

残酷统治和管理,辖区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许维斋网罗的手下孙德胜、唐井安、林亚东、沈观仁4个分队长,号称“四大金刚”。他们助纣为虐,成了横行一方,鱼肉百姓的兵痞恶棍。

1942年秋,阜东县(今滨海县)界牌乡26个农民为了活命铤而走险,到庆日新公司东二圩挑“毛盐”,被孙德胜带人伏击抓获。他们可怜巴巴地分辩说自己是庄户人,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因农田遭海潮淹没,颗粒无收,家家户户揭不开锅,现在连野菜都吃不上,到盐场来摘点盐蒿菜,万不得已弄点脚盐(泥巴盐)度春荒。但孙德胜硬说他们是偷“毛盐”的“毛猴子”,要严加惩罚。一个老农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流着泪指着身边的孩子说:“你看这个孩子快饿死了,请老总发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孙德胜大吼道:“大胆刁民,你他妈的全是胡说八道,分明是‘毛猴子’来偷盐的,还敢狡辩,到了陈家港你们才能知死。”不由分说,吩咐手下一阵枪托乱捣,然后将26名贫民五花大绑押到陈家港。当天夜里,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屈打成招,违心承认自己是偷盐的“毛猴子”。

第二天早上,孙德胜报告团长许维斋和伪区长杨圣传:这些穷鬼榨不出一分钱,怎么处置?许维斋说直接送他们上西天。杨圣传明知这些人是附近农村的穷苦

农民,见捞不到油水,想了想也狠下心来对孙德胜说:“你和张大山把他们送给日本宪兵队吧。”日本宪兵队可是个杀人魔窟,进去的人不死也得塌层皮。这些人被押到宪兵队后,日宪兵队长呲牙咧嘴狞笑着说:“毛猴子,叭嘎呀噜,统统死了死了!”

据谢以生老人回忆,行刑的那天早上,阴风飒飒,陈家港戒备森严,一片白色恐怖。日本鬼子和伪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押着26个五花大绑的农民往新街南门口走去。街道两旁的人们见此情景无不伤心落泪,痛恨这个暗无天日的世道,痛恨这帮惨无人道的鬼子和汉奸。

杀戮开始了,孙德胜将26个农民每4人捆成一组,摁跪在地上。行刑的刽子手四人一组,分若干小组,杀一组换一组,轮番杀戮。刽子手举着鬼头大刀,对准每个农民的脖子猛砍一刀,然后推进挖好的大土坑里。全部杀完后,残忍的日伪军唯恐留下活口,又向坑里投掷手榴弹,杀人坑四周血肉横飞。谢以生老人清晰地记得,最后杀那个孩子时,刽子手再也砍不下去,不忍心下重手,只在孩子的后背轻砍了一刀,就匆忙推下坑,薄薄地埋上一层土。鬼子走后,那个孩子在土中挣扎,发出微弱的声音喊“救命”。灭绝人性的孙德胜刚走不远,听到孩子的呼救声,立马回身,对准孩子连捅三刀,最后又拔出盒子枪补上一

枪,结束了这个年轻的生命,血腥场面令人不寒而栗。在场的许多老百姓惨不忍睹,暗自落泪。不少妇女忍不住哭出声来。残忍场面令人目不忍睹。

据后来调查,这批冤死的农民有7户绝了后。在日伪统治时期,被孙德胜残杀的所谓“毛猴子”和贫民百姓有51人之多。据陈家港市民谢以生老人回忆,陈家港26人坑位置在现陈家港镇新老河卫生室边上。谢以生老人的回忆得到比他小两岁的88岁老人杨以方的有力佐证。杨以方老人回忆说,他当时七八岁,沿街一路跟到杀人现场。谢杨两位老人的回忆吻合。陈家港现在还有不少目击者仍然健在。

许维斋、孙德胜这伙汉奸滥杀无辜,丧尽天良。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血债终究血来偿。1946年初,孙德胜被淮北盐特区公安局抓捕归案,并在陈家港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执行枪决。陈家港全面解放时,罪大恶极的许维斋潜逃到赣榆海边的船上藏匿,最终被我抓获判处死刑。

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1945年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恶贯满盈双手沾满人民血迹的许维斋、孙德胜等民族败类终究没有逃脱历史和人民的惩罚,最终身败名裂落得汉奸卖国贼的可耻下场。

(转自《红笺留香》)

# 第一个红色机场——延安机场

延安机场始建于1936年1月,由原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17路军杨虎城所部修建。西安事变后,陕北地方革命武装将原有根据地大部恢复,接管了延安和延安机场。该机场是土质跑道,多年失修,已不适用于飞机正常起降。抗日战争后期,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革命根据地与外部联系亦有所增加。1944年春,中共中央决定修复并扩建延安机场,成立机场修建工程处,王弼兼任处长,刘凤为监工员,朱世元为工程技术人员。修建工程没有机械化设备,搬运建筑材料,破碎石子,碾压道面,完全靠人工劳动。因此,需要人力较多,不得不动员延安附近各县的民兵分段包干修建。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到延安党政军干部,以及工农群众都参加了扩建机场的劳动。1944年底,扩建工程竣工,建成沙石(碎石、沙子、黏土)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相应修建了一些机场附属建筑。与此同时,建立了机场管理机构——机场勤务股,隶属于延安卫戍司令部,业务上属

作战部空军组领导。油江为股长,石蕴玉等4人为参谋,并派1个连驻守机场,担任警卫。

机场勤务股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管理和警卫机场,接受和放飞在延安机场起降的飞机。当时机场的设备极为简陋,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机,以及T字布、风向袋和小旗帜等。

在机场修建工程进行期间,1944年7月22日,驻华美军司令部派遣的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抵达延安。此后,机场经常有美军的运输机来往。保障美军运输机起降成为机场勤务股的日常工作。到了1945年8月以后,机场承担了3项重大起降任务。一是1945年8月20日,接受了从江苏扬州起义飞来的汪精卫专机“建国”号;二是苏联红军往返延安至沈阳,接送八路军干部的飞机;三是1945年8-9月接送毛泽东主席一行赴重庆谈判的飞机。

延安机场是中国共产党整修、使用和管理的第一机场,也是第一个红色机场。(航空工业出版社)

我从小便对飞机产生了兴趣。我还是孩子时,就喜欢放蝴蝶风筝和制作橡皮筋飞机航模。长大后在中国空军科学院工作时,致力于航空力学和航空工程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我十分幸运地被派往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任职。由于当时中国港口遭到封锁,无法向国外购买飞行教练机,因此我们决定自己动手制造。研究所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研究所的地址是在成都老西门附近的城墙脚下,近处有一座庙宇。我们的车间就设在庙宇的空场上,在城墙下挖了一个防空洞,用来放置贵重的设备和图样。在建造的过程中曾因敌机的频繁空袭迫使我们迁到郊区的橘树林中。

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材料问题。大部分的飞机都是用钢和铝合金制成的。但这种合金我们手头只有几块,所以决定制造一架竹木飞机。所用的木材主要是云杉和夹板,但当时我们没有适合制造夹板的木材,又没有人制造过夹板。设备处木材供应科派了一个小分队到大西南原始森林去寻找适用的木材。

第二个难题是黏合剂。我们有牛皮胶和鱼胶,但是皆不耐水,且会发霉生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木制飞机时代,美国和欧洲曾用牛奶做成酪蛋白胶水。可是我们没有人知道它的配方,而且附近地区牛奶又不多。于是制造黏合剂的任务交给了航空研究所所属的化学工程室。

当木材小分队在崇山峻岭中寻找适合的树木和化学工程室在研究牛奶胶的时候,我们设计处的人员就埋首于制定制造一架单翼飞机的计划。

试飞的驾驶员在座舱里隔着挡风玻璃向我们挥挥手,接着开动了引擎。这只银色大鹏鸟似的飞机要从停机坪滑到跑道上。此时我的心情宛如一个母亲在看着自己的孩子试步。驾驶员加大引擎的油门,飞机突然向前一个猛冲,接着是短暂的沉寂,飞机已平稳地停在跑道上,而起飞前的这一间歇令人觉得好像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日。最后,又一个猛冲把飞机推向前,朝着我们的方向冲来,越冲越快,机翼拉平了,快到我们面前时,起落架的主轮离开了地面,旋即升到空中。坐在机上的空军助理指挥员在空中向我们挥舞着双臂。我们每一个人都欣喜若狂,高叫着“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后来抗日战争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盟国成立了飞行训练部队,因此我们这架独特的竹木飞机从此退了役。但这对它已无关紧要,因为它已载入了中国航空工程的史册,同时它也已铭刻在我们为之流汗的每个人的心坎上。(航空工业出版社)



1943年中国制造的世界上唯一的竹木飞机——“研教三”式教练机。航空研究院设计制造,机前是试飞员和设计研制人员。

## 渡江胜利纪念馆:

# 千帆竞渡驶向光明胜利

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三汊河的人江口南侧,红色的千帆竞渡群雕巍然屹立,它由49根红色柱体组成,形成“船帆”和“桅杆”的造型。群雕东侧就是不久前完成改造出的新的渡江胜利纪念馆。

时间拨到72年前。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江千里北岸集结。4月22日,“三浦战役”结束后,南京的北大门洞开。

为了阻挠解放军渡江,国民党军提前破坏了北岸所有船只。沿江的百姓听闻解放军要来,纷纷拉出自家船只,支援前线。这些船小的只能坐3到5人,大的能装上百余人。还有船工临时发明创造,把成捆的木头扎成木排,甚至有老百姓捐出了自家的门板用来造船。

23日晚,来自下关电厂的“京电号”小火轮,载着三野8兵团35军先遣部队抵达南岸,随后又数次往返于下关和浦口间,共运送



了14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渡江。

眼看大势已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早在前一天就下令撤退。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在南京并未受到太多激烈抵抗,一路直奔总统府。总统府青天白日旗被扯下,宣告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覆灭。

4月24日上午11时,南京城上空传来广播的声音:“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24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南京这座被国民党政府统治了22年的古城,获得了新生。南京解放了!”

为应对接管城市时可能出现

的混乱局面,当时的中共南京市委充分发动学校、工厂、商店、机关的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店运动。我党从各地抽调的一批干部组成了“金陵支队”,提前学习入城守则,整顿思想作风,掌握城市政策。最终,南京城在解放期间没有断水、断电、断通讯,没有大乱,也没有遭受大的破坏。

时光流转,沧桑巨变。72年过去,当年的子弹纷飞,如今已是水清岸绿,鸟语花香,整治后的滨江风光带南北延伸开来,成为南京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2021年7月,渡江胜利纪念馆推出“天翻地覆慨而慷——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展”,展出246幅历史图片、317件珍贵文物文献,通过实物、图片、场景模拟、历史影像、口述历史等形式,向游客讲述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南京的故事。曾立下赫赫战功的“京电号”小火轮,在历经修复后重新出现在纪念馆广场上。

(新华日报)

## 左权:愿拼热血卫吾华



左权,1905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学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社会研究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是“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黄埔军校教导团任排长、连长,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先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

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1931年12月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军第26路军举行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后,任红15军政治委员,后任军长兼政治委员。1933年后,任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左权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1936年,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第二总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扫荡”,取得了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战役的胜利,威震敌后。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严密细致的参谋业务,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彭的赞扬。1940年秋,协助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卫战,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

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他还“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从1939年至1941年,他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40余篇。左权为创建并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大人民抗日武装,为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官,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为其举行追悼会。周恩来称他为“足以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誓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新华社)

## 曾仁文:宁死不当俘虏



曾仁文,1906年12月生于江西省吉水县八都镇兰花村。1918年秋,入本村私塾读书,1922年,入县八都镇高小学堂。1927年,曾仁文投身于农民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冬,参与领导吉水县仁寿区的农民暴动,任少共仁寿区委书记。1930年10月,任少共吉安县委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后,任赣江游击总队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独

立13团政治委员、红八军团第23师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曾仁文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任中革军委收容队政治委员。红军到达陕北后,曾仁文先后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组长、援西军保卫部部长等职。

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仁文任八路军兵站部大宁兵站特派员。同年12月,任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政治部保卫科科长。1939年春,任八路军兵站部第2办事处政治委员,后兼任办事处主任,领导从河南淅池至山西壶关的8个兵站的工作。

1940年秋,为开辟新的交通线,晋中支队(即同蒲兵站)成立。任支队长兼政委的曾仁文,很快把晋中支队培养成了一支能打善战又会做群众工作的特殊队伍。这支特殊队伍除安全掩护过往领导和军需物资转送外,还多次组织小分队、武工队出击日伪

军,援助友邻部队。

1942年春,曾仁文任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参谋主任,成为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的好助手。当时环境恶劣,日军经常进山“扫荡”,筹措后勤物资十分困难。如何使储存的物资不被敌人搜去,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他走遍驻地附近每条山沟,勘察地形,选择洞库地址,然后组织战士夜间施工,再加以伪装。日军数次进山搜查,均一无所获。

1943年5月,为掩护杨立三和后勤机关转移,曾仁文在山西和顺指挥部队阻击日军。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因弹药耗尽,曾仁文和十几名战士跳下悬崖,英勇牺牲,时年37岁。

(新华社)

